

『十七年』

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SHIQINIAN
WENXUE LISHI PINGJIA
YU
RENWEN CHANSHI

◇ 吴秀明 主编



浙江
大学
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 吴秀明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308-05202-3

I. 十… II. 吴…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294 号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吴秀明 主编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515 千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202-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本书编委会

顾 问 陈 坚

主 编 吴秀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英 李杭春 李 力 吴 晓

吴秀明 陈力君 陈建新 郑淑梅

段怀清 盘 剑 黄 健

前 言

早在建国后第一个十年之际,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述。这些文学史与第一个十年之间权威领导人对于新中国文学或者社会主义文学的阐述,各种文艺运动中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讨论,大量作家的具体创作等一道,不仅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学的主要内容,而且也逐步确立了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历史阐述框架,影响甚至规范了当代文学写作上的一种模式。上述体系、框架和模式,尽管在后来的运动中也曾遭到过批判,但其建构起来的有关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并为当下的建国初期文学史研究提供着依然富有思想和实践启迪的话语资源。

对于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局面,涌现出了大量新的信息。首先是当代文学的生成环境与建国初期相对而言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在继续扩大增加;同时,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史的认识,包括对于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等,在学术思想领域也引发了多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上述讨论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将“当代文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其纳入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以及同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世界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定位评价或比较分析;与此同时也提出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的新的期待。这些著述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思维方式、文学审美、艺术价值以及文学语言等方面,对 80 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史叙述进行了反思和超越。

90 年代以来,随着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反思清理、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进程的考察,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话语的介绍,对于建国后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加强深化。

为了在上述当代文学史研究背景之下,进一步总结已经取得的学术思

2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想经验,并对“十七年”文学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于2006年4月21日至23日在浙江杭州联合组织召开了“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刊物及欧美学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中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价值、“十七年”文学经验的文学史意义、“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学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和启发性的观点,充分揭示出当下“十七年”文学研究中一些既受到广泛关注、同时又极富挑战性的命题和问题。本书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一个积集,它按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辑:

第一辑:总体历史评价。主要就“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及其整体研究和历史评价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有些话题是近年来有争议的,但因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关系重大,此次讨论时又被提出来了,如“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矛盾性特征、内在精神结构、文学生态环境、主体资格与话语权分配等;也有的是此次会上提出的新命题,如“元叙事”、“社会主义伦理”、“人民文学”等。它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新思路、新走向。

第二辑:文化现象阐释。重点就“十七年”文学文化现象问题进行阐释,这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且成果颇丰的一种研究——文化批评。它大致涵盖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与精神生态、文化体制与大众传媒、题材选择与文化想象、文学生态与文体意涵这样四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些论题极具创意,如“知识主体精神生态”、“冷战焦虑”、“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生成”、“国家工业化想象”等。这说明文化批评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力,它似乎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能指。

第三辑:作家作品解读。实际上是对以前相关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重读。它涉及《上海的早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刘志丹》、《红旗歌谣》、《“锻炼锻炼”》以及宗璞、陈翔鹤的小说和作品中的“引路人”形象、小资知识分子形象、“十七年”的鲁迅研究等方方面面。上述这些作家作品,有的似乎有定评的,尤其是被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时所定评的,但基于当下新的理性认知和对话语“夹缝”的细究,人们从中又读出了新的况味,甚至

得出了不尽相同的新的结论。凡此种种,不仅有助于深化、细化“十七年”文学研究,而且在立足文本、深入文体这点上也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三年前,也就是2003年10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曾成功地在杭州举办了“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部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文学的世纪之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再度合作召开这样的会议。尽管由于主客观诸方面原因,此次会议还存在不少缺憾,有些提交的论文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但从总体看,会议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与会代表。也值此机会,感谢《文学评论》编辑部胡明先生和董之林女士,他们为开好这次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董之林女士,从会议筹备到会后的报道等,整个过程都严格把关、细心过问。这种认真务实的态度令人钦佩。

现在会议早已结束了,杭州也从四月的阳春进入了十月的深秋。回忆往事,良多感慨。谨以此书,聊作小小的纪念。

吴秀明

2006年10月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辑 总体历史评价

-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董之林 3
- 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
——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及其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 吴秀明 24
- 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 旷新年 33
-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
——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张志忠 45
- 重构现代性:国家意志与文学使命
——略论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 黄 健 57
- 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 毕光明 69
- 主体资格的认定与文学话语权的分配
——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生态环境的反思 郭剑敏 76
- 重在深层的清理与反思
——论“十七年”文学中精神结构及质素与今天精神世界建构
之关系 傅书华 85
-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兼与夏志清教授商榷 张 锦 101
-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 肖伟胜 111
- 当代开国文学的建构及其文学形态 南志刚 118

2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 五个“关键词”的修订与当代文艺思潮的演进 王 尧 128
“革命通俗文艺”文学史论断的批判
——兼论当代“红色大众文艺”的特殊形态 刘起林 140

第二辑 文化现象阐释

- 从胡风悲剧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与人格自塑 张光芒 153
“自我”叙述与知识者的历史想象
——从五四到“十七年”再到“新时期” 荆亚平 164
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权力的“隐性”叙述及终结
——“十七年”文学的一种文本解读 段怀清 174
皈依与反叛
——“十七年”传统历史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叙事
..... 陈建新 张玲燕 187
冷战的焦虑：“十七年”文学的文化心态与特征 朱水涌 197
《文艺报》“编者按”简论 程光炜 209
在焦灼与兴奋中趋向大同：“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
——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心 斯炎伟 220
重返文学的现场
——建国前后文艺副刊考古手记之一 郝富强 234
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
——对“十七年”与“文革”上海文学的一种考察 ... 张鸿声 李 力 244
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贺仲明 257
历史幽灵的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刘复生 268
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
——以“萧也牧批判”为个案的一种考察 周保欣 280
“十七年”文学中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黄 擎 291
“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
——以《青春之歌》、《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中心 李遇春 296
论建国后乡村题材作品的非乡土化特征 王文胜 308
中国与美国的理想主义者
——“十七年”电影与早期好莱坞“西部”电影之比较
..... [美]史 瞻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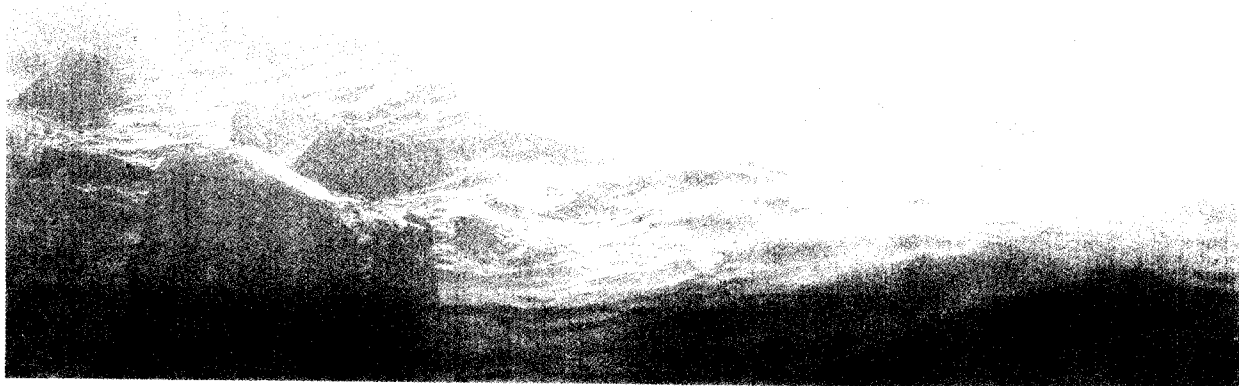
- “十七年”时期中国动画电影的独异性 郑淑梅 吴晓静 323
 戴着镣铐的舞蹈
 ——关于 60 年代历史剧大讨论的思考 杨利娟 332

第三辑 作家作品解读

- “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上海书写
 ——重读《上海的早晨》 吴秀明 郭传梅 341
- “突变英雄”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由《青春之歌》谈开去 叶立文 354
- 国家意志的叙事焦虑
 ——解读“引路人”兼谈“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设置 陈力君 362
- 吊诡的新人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张 莉 375
- 追寻·牺牲·狂欢:《林海雪原》的战士形象
 ——兼论古典小说对其影响 申艳国 384
-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张 翼 395
- 《“锻炼锻炼”》潜文本释义
 ——关于赵树理评价问题 傅异星 403
- 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
 ——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 孙先科 410
- “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话语”
 ——论陈翔鹤的两篇历史小说 郭冰茹 422
- 《刘志丹》:一本命运坎坷的小说 詹 玲 431
- 从曙光乍现到山雨欲来
 ——九叶诗人在 1949—1966 孙良好 446
- 无法抵达的民间
 ——《红旗歌谣》抒情主体性及其他 吴 晓 胡苏珍 455
- 透视鲁迅的精神映象
 ——谈“十七年”的鲁迅研究 孟念珩 465
-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秀明 段怀清 472

第一辑

总体历史评价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董之林

对我而言,重新打量“十七年”小说^①,源于对一种元叙述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学术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全面展开,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无不唯此是瞻,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在这里形成一个爆发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趋势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这种元叙述以服膺政治、否定个性为由,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政治的附庸,没什么文学价值,赵树理小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农兵方向”这些词句,已不再是评定标准;也与“文革”时期把作品统统斥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封资修黑货”不同。可悲的是,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的文学逐出了文学史讲堂。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的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

这种粗糙究竟忽略了什么?中国作为跻身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行列的后来者,相对于主流,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一种交互关系的边缘性。在文学

^① 关于“十七年”文学,笔者近年出版了两本书:《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4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中,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演化过程的复杂体验和独有的表现。尽管文学发展与现代化关系密切,而且有些作品从语言到结构,俨然现代主义文学派头,但差异毕竟是其核心。因此在文学史领域,是无法套用西方或其他民族国家任何一种叙述模式加以比附的。以启蒙话语为背景的文学史判断,恰恰忽略了文学表现这一边缘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文学之特点。

这种粗糙也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或者说,这种元叙述的确立,不完全出自80年代对西方思想的横向移植,早在三四十年代,在革命文学内部就有表现。当时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革命文化人”对赵树理小说并不十分认同。^①究其原因,不是他们对革命文学、大众文学的口号有怀疑,他们是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受五四以来苏俄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影响,却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来自基层社会、不符合流行的现代文学观念的作品的不屑与轻慢。在解放区,赵树理小说被鼓吹为“工农兵文学方向”,即便如此,在知识的层面,他的艺术表现也远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并一直延续到后来,被当作“十七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断裂的例证。如果把小说模式看作一种“知识”,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相比,这里的确出现了“知识”链条上的“断裂”,确切地说,是一种变异。但历史似乎有意与叙述者捉迷藏,制造“断裂”的陷阱,以掩盖处于现代主流趋势的边缘的文学特点,掩盖连接本土上下文的历史相关性。

至20世纪中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断升温,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关于解放区到建国后的文学究竟如何,难以做深入细致的体察。只见“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此起彼伏,而口号下面文学的实际,特别是文学在生产、撒播与移植过程中的变异与演化,缺乏切实有效的论证和结论。80年代百废待兴,“十七年”文学研究更是行色匆匆,看起来“破字当头”,批判者振振有词,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视角,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只能沿袭旧制,不同的是变换了说法,把以前拥护为正确的,现在说成错误,以前批判为错误的,现在“平反”为正确。以当时流行的见解,这是新时期“拨乱反正”的产物,是文学史研究对“十七年”文学“反思”的结果。结论既出,这一时期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没什么艺术经验可言。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写”中得以镜鉴和深化,因此需要反思的不是“重

^①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写”本身,而是“重写”中出现的问题。今天看来,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缺乏建树有客观原因:长期封闭的环境,使人们在理论上一时找不到恰当有力的切入点。但也不能忽略主观上的原因:在急于实现经济乃至文学现代化的焦躁心理驱使下,即便概念推陈出新,理解上也有失偏颇。例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谈到“反思”(reflection,中文意为:反射,影像,倒影,反省,沉思,反映),他对反思的理解并不是“逆反”或“对着干”。他认为反思不仅涉及对象客体,更主要的是对于那种与对象相关的主体的“思想”,或包含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说,“反思”的哲学本意,不仅在于它所“关怀的”对象客体,也包含“思想对客体的关怀,故而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①。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恰恰缺乏对主体思维方式的反省,进而重复了“十七年”至“文革”以来的“大批判”思路,尽管批判者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正如以一种“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无法解开“一体化”形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死结,把复杂、动态的历史看成铁板一块,只要认定文学与政治脱不了干系,而且对这一时期政治的否定意见又占了上风,就以强调个人和个性的启蒙话语为依据,将它们统统打入地狱,来一次历史上的重新站队。事情好像解决了,但问题是,在几番站队后,历史变成了虚无主义狂欢的场所,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

关于政治结构和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学家认为:“结构绝不能被简单地概化为施加在人类主体之上的强制性因素,相反,它们是能使人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从原则上说,结构总是能够从结构化过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②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指政治与人类主体的关系,而意识形态与文学也隐含着这种结构关系。结构化过程的二重性在于:一方面,结构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建构出来;另一方面,主体的实践活动又是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

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元叙述问题在于,先验地确定有一个悬置于主体实践活动之上的社会与文学结构,只是由于当时的作家、批评家没有明智地加以选择,他们的实践活动和艺术经验便不得不被排除出宏大的历史叙述。与这种天真的愿望相反,在本土文学实践之外,人们找不到另一处“标准化”的、叙述者一厢情愿的历史。何况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主体的王国

^①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文版),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② [英]A·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见韩少功、蒋子丹主编《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页。

6 “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

是受到限定的。人们创造了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受历史制约的行动者来创造社会的,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的”。^①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不受制约的历史,只有受到历史限定,却在限定中有所作为的人类主体;没有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文学,只有因文学参与而决非单一化的意识形态过程。

历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复杂的基因工程,认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②。现实由过去发展而来,今天的文学中隐含着历史的酵素,未来文学也必然在相关的历史基因中发展起来。赵树理的小说,以及围绕他的作品的一系列议论所构成的文学现象,凸现了中国文学处于现代化交互关系中曾有过的边缘感受,也孕育着现实与未来文学的走向。

二

历史本身也有生命,复杂而充满变数。但被遮掩了历史细节的宏大叙述,仅凭一些异地条款便作出决断,全然不顾多种因素相互缠绕、不断碰撞和妥协的过程,这就等于轻易断送了历史的性命。这种机械地处理历史的方式,正所谓“言者有心,听者无意”,叙述如同隔靴搔痒,总也搔不到痒处。

80年代,对赵树理的评价由“文学的方向”遁入“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泥淖,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从“解放区”到“十七年”)缺乏艺术水准的代表。对赵树理作品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工农兵文学”的反智倾向;二是“问题小说”的服膺政治倾向。两者之间,服膺政治是主要问题,反智是由此带来的表现形态。

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刚享有文名,他的作品由于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特点就引人注目。历史的吊诡在于,8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否定意见,40年代曾以肯定的面目出现。比如,当时左翼文化人和批评家纷纷称赞赵树理响应“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令,代表“工农兵方向”,因此才取得文学上的成就。这一点正是80年代赵树理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40年代批评家对赵树理的肯定,却为日后的批判埋

^① [英]A·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第42页。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下伏笔,虽然当年他们绝无此意,但这样的后果,也暗示了在前期肯定和后来否定之间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解放区的“革命文化人”开始并不怎么欣赏赵树理这位“农民作家”^①。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中说,1942年他调赵树理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第二年7月,赵树理下乡回来交给他一篇小说,这就是《小二黑结婚》,并由彭德怀交太行新华书店付印。“当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说迟迟不能出版,杨献珍只好再去找彭德怀,“向他说明情况”。这一次,彭德怀写下“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话,并“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小二黑结婚》“十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与赵树理小说在基层受欢迎的景象相比,知识界冷清多了:“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对《小二黑结婚》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甚至说“这是海派”。^②

由于彭德怀、杨献珍和北方局领导出面干预,赵树理小说出版后又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形势有所扭转,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经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至1946年左右,肯定的意见才越来越多,《华北文化》、《文汇报》、《解放日报》、《北方杂志》、《群众》、《文萃》、《人民日报》等报纸期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盛赞赵树理小说。

对赵树理小说从“看不上眼”到认同、称赞,转变的原因固然是抗战以

① 1947年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土地改革会议,赵树理同志以文艺界代表身份参加。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新闻,称他为“农民作家”。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1980年1月号。

②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别是在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据“赵树理年谱”记载: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总军委于20日发出通知,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整风必读文件”。见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也就是说,对《讲话》大范围的普遍学习应该是在1943年以后。——笔者注

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①,大众化的通俗文艺成为一时潮流,革命的文化人争先恐后地投入这个行列;除此之外,左翼文学阵营长期流行的理念——革命文学必须受革命理论指导——也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出版,正值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期间,把赵树理小说归结为政治运动和《讲话》指导的结果,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换句话说,肯定赵树理的艺术成就,毋宁是一份关于艺术理念的政治宣言。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作品就“只说了他的好处”,周扬认为自己这样做,“与其说是在批评甚么,不如说是在拥护甚么。‘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②。不仅周扬,当时的评论都特别强调赵树理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在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下才取得成功:“《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这一部优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风’运动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养上会有怎样深厚的影响”^③。茅盾这段话后来被引用在《中国新文学史稿》^④,作为现代文学史对赵树理小说的定评。而史家同时指出,这一大众化的“新文艺运动”始于《讲话》之前,“虽然方向上还没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那样明确,但在解放区的确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条件”的这一事实^⑤,却被忽略了。

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文学理论盛行的年代,同时也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学习苏俄以及西方文学经验,使一种现代小说观念逐渐成形的年代。当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化人投奔解放区,投奔延安后,他们的政治追求连同艺术旨趣,直接影响延安以至建国后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与评断。40年代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大众化”文艺运动,对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文化和文艺思想却芜杂多元的文化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思想整合。但运动就像“水过地皮湿”,很难说收到“心悦诚服”的效果。赵树理在解放区闻名,其中有政治干

① 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十二期。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

②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

③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卷第10期,1946年12月。

④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314、315页。

⑤ 同上,第16页。